



辽金元史学研究

Liaojinyuan Shixue Yanjiu

吴凤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辽金元史学研究

Liaojinyuan Shixue Yanjiu 吴凤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金元史学研究 / 吴凤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04 - 8353 - 3

I. 辽… II. 吴… III.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辽宋金元时代 IV. K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6903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周慧敏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辽、金、元三个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和西夏、两宋的历史或相联系，或相衔接，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又一个多民族大迁移、大组合、大融合的历史面貌。

辽、金、元三朝历史的重要，还集中反映在它们都是以少数民族即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的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因此，关于辽、金、元三朝历史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产生了一些名家和名作。同研究辽、金、元三朝历史比较起来，史学界关于辽、金、元三朝的史学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一些。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献资料的局限，二是关于史学的研究，人们首先要关注史学上的那些影响巨大的传世之作。由于这两个原因，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辽、金、元史学尤其是关于辽、金史学研究，就显得很不够了。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曾经做过一些考证的和补作性的工作，然而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似也未曾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随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的发展与深入，研究者对辽、金、元史学有了更多的关注，不论是对个案的研究，还是对整体面貌的概括，都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反映了史学史研究者对中国史学是多民族史学积累、汇合而成的学术理念更加自觉了。老一辈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白寿彝先生和尹达先生都十分重视对少

数民族史学的研究，而辽、金、元三朝的史学，除了具有中国史学主流的共性，也具有各自的个性，其中不乏民族的特点。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史学上的反映，因而应当引起史学史研究者的更多关注。

关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问题，有两点是需要明确的。第一，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有的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流传于后世的文献很有限，而这些少数民族的史学活动以及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不少是保存在汉文文献中。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史学，一方面要十分重视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十分重视汉文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把二者充分利用起来，不断丰富我们对少数民族史学的认识。第二，研究少数民族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宗旨，是揭示这些史学自身的特点以及它们同中原史学的关系，揭示它们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历史文化认同的发展趋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而说明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

本书作者吴凤霞教授始以辽金史为研究对象，继而致力于辽金元史学的研究，这使她对历史与史学的关系有比较合理的认识，这在本书中有明显的反映。这里，我想特别提到本书的另外两个特点，一是辽金元三朝的修史制度和各民族史家的风貌，在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之中，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中国古代多民族史学发展的画卷；二是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如“天下一家”、“国俗”、“正统”等，以及当时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诠释，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我以为，这两点可以看做是本书的闪光之处。

《辽金元史学研究》在这一领域，是开创性研究成果之一，无疑会受到史学界同行的重视。当然，作为一部断代史学研究著作，同其他一些断代史学著作一样，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样

做到寓通识于断代之中，当是一个可以进一步共同探讨和努力的目标。

是为序。

瞿林东

2009年7月30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前 言

辽金元三朝是 10 世纪初至 14 世纪中期三个相接续的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皇朝。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阶段之一。由于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相继建立政权，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面貌与文化特征，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与史学呈现出独特的风貌，表现出一些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征，增添了许多少数民族因素，极具多民族特色。值得重视的是，辽金元三朝的史学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和较多共同性。由政权建立初期的史职无专人，祖宗遗事口耳相传，到史官组织渐成规模、史家以保存信史为己任、多民族历史撰述成果丰硕、中国以往朝代形成的优秀史学传统得到充分的发扬，这一切突出反映了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展示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丰富内涵。

辽金元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元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相关的研究不被重视，成果不多。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辽金元史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增加了辽金元史学的分量，学者们从史书的编纂、史书的内容和体例、史家的思想、史学的民族特点、修史机构与史官等多重角度考察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这与以往对于辽金元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史料的整理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同其他时期史学研究（如两汉史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两宋史学等）比较，关于辽金元史学的研究显然还是很薄弱的，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辽金元史学作贯通

性的综合的考察，以求发现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类比中揭示其共性与特性，并力求在一些方面充实辽金元史学的研究，也希望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盼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家携手共进，将辽金元史学研究引向深入。

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看，研究辽金元史学对于加强民族史学的研究，完善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是有重要意义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并不平衡，有关少数民族史学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白寿彝先生生前力主发展民族史学，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多民族性体现得还不够充分，少数民族的史学涉及得太少。辽金元三朝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这一时期的史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契丹、女真、蒙古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也包含了契丹、女真、蒙古史学的某些因素。本书最基本的立足点在于，尽可能在史学史研究的层面上，对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所反映的多民族特点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彰显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史学的综合形态，加深人们对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探索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辽金元时代各民族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目 录

序	瞿林东 (1)
前言	(1)
第一章 辽金元时期的历史与史学	(1)
第一节 多民族国家演进的几个突出特征	(1)
一 广大边区的开发与封建化进程	(1)
二 各民族的交往与重新组合	(6)
三 由分治走向新的统一	(10)
第二节 多民族史学发展的新风貌	(16)
一 经史翻译与多种民族文字之史书的出现	(16)
二 民族史撰述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4)
三 关注修史与修史的制度化	(28)
四 史家视野的开阔与识见的出新	(34)
第二章 辽金元三朝修史制度	(42)
第一节 辽朝的史官与官府修史	(42)
一 辽朝史官的构成	(42)
二 辽朝的修史活动	(53)
三 辽代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原因	(57)
第二节 金朝修史机构与史官构成的特点	(59)
一 国史院、记注院与著作局	(59)
二 金代国史院的修史活动	(73)
三 金朝修史制度与史官的民族构成	(83)
第三节 元朝修史机构与修史制度	(86)
一 翰林国史院与奎章阁学士院	(86)

二 元朝修史制度的发展	(106)
第三章 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丰富	(111)
第一节 实录与民族史撰述的突出成就	(111)
一 辽金元三朝所修实录及其价值	(111)
二 反映蒙古民族早期历史的《蒙古秘史》	(116)
第二节 《辽史》、《金史》、《宋史》之制作	(120)
一 “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编纂思想	(120)
二 内容特点与体例创新	(125)
三 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129)
第三节 典制体史书的盛大气象	(135)
一 《文献通考》与《经世大典》的宏大规模	(135)
二 多种制度史的编纂	(140)
第四节 地理书和域外史撰述	(144)
一 恢弘的《元大一统志》	(144)
二 域外史和其他历史撰述	(148)
第四章 各族史家史学思想的异趣与趋同	(155)
第一节 强调史学的经世功用	(155)
一 以古鉴今的萧韩家奴	(155)
二 讲究史鉴功用的察罕	(157)
三 追求“笃实之学”的赡思	(160)
第二节 恪守信史原则	(163)
一 提倡“史笔天下之大信”的耶律孟简	(163)
二 记祖宗之事“一无所隐”的完颜勗	(164)
三 以存信史为己任的元好问	(165)
第三节 历史编纂思想的创获	(172)
一 王若虚对“史例”的探讨	(172)
二 胡三省对《通鉴》学的发展	(179)
三 马端临在历史编纂思想上的继承与创见	(182)
第四节 重视文献征实	(187)

一 欧阳玄重在“事实不妄”	(187)
二 苏天爵崇尚文献有征	(189)
第五章 历史思想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	(194)
第一节 民族观的发展	(194)
一 民族区分与天下一家	(194)
二 民族本源与多民族共祖	(202)
三 重“国俗”与“因俗而治”	(207)
第二节 正统观念的变化	(213)
一 “有传国宝者为正统”	(213)
二 混一天下可为正统	(215)
三 继承百王而为正统	(220)
第三节 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大趋势	(225)
一 多民族历史认同的发展	(225)
二 传统学术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231)
结语 辽金元史学的历史地位	(240)
附表	(244)
参考文献	(256)
后记	(268)

第一章 辽金元时期的历史与史学

任何时代的史学都与其时代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说：“一个时代的史学孕育在它所存在的时代中，并且与这个时代发生交互的影响。”^① 10至14世纪中期是中国的辽宋金元时期。在这个时期的400余年间，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三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广大边区的开发和封建化；一是不同民族的重新组合；一是区域分治走向全国统一^②。也就是说，辽宋金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边疆开发与治理的重要时期，也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辽金元三朝的历史发展是其史学特质形成的社会基础，辽金元史学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和时代特点。

第一节 多民族国家演进的几个突出特征

一 广大边区的开发与封建化进程

10至14世纪的中国，北方民族十分活跃。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兴起，并建立了辽、金、元三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皇朝。源于边疆的统治民族都特别重视边疆地区的建设，广大的边区因而陆续得到开发，并逐渐封建化。边疆地区的发展，使当时中国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边区的封建化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社会生产进步的新气象。

① 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②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属于东胡族系，源于鲜卑，是鲜卑宇文部的别支。契丹族早期活动的主要区域是西拉木伦河（古称潢河）和老哈河（古称土河）流域。史称“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①。隋唐时期，契丹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成为隋唐北部边疆的重要政治力量。10世纪初，在唐朝走向衰亡的时候，契丹人在其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不失时机地建立了国家，并先后征服了周邻的奚、室韦、渤海、女真等部族，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这个以契丹族为主的多民族政权历史上称为辽朝。辽初，辽太祖、辽太宗统治时期，不断南掠中原，利用中原不同势力的矛盾，从石敬瑭的手中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之地。到947年，又灭后晋。其整个疆域大体上由盛唐时期的北疆地区和燕云地区两个部分组成，总面积相当于北宋版图的两倍^②。这种较大范围内的区域的统一，沟通了长城南北，尤其有利于北部边疆的开发。

学者们的研究证明，辽朝200余年的统治使北方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认真研究了辽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陈述曾就辽朝社会的进步作了这样的分析：

契丹国内的牧场（草原）上，有些地区出现了插花田。在牧场上活动的即汗国兵马；在插花田里耕作的人们即俘奴，提供汗国食粮。国家体制，继承了过去北方游牧社会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中原汉地的封建统治制度。契丹本部和先后附辽的属部以及渤海燕云，包括猎区、牧区和农区，社会组织及生产关系，有氏族的、奴隶的和封建的差别，他们在统一的政权统治下，各自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也各自使用各自的语言。二百余年，“因俗而治”，获得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由于国富兵强，威慑四邻，开辟了祖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局面，并为

① 《辽史》卷32《营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 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全国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内封建因素的增涨，带动了草原社会，部分奴隶转化为平民或半自由民，贫富分化，也有的平民自鬻为奴隶。农区牧区不同，牧区之内也有差别。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就全国说，还没能完成统一的经济基础。南部农区封建经济带动着全国，北境农牧错居区、牧区、猎区分别不同的基础上，各以不同的步伐向封建过渡，国内主要部分的过渡虽接近完成，有的甚至刚在起步走，这一军事政治的联合体便瓦解了。^①

从这段分析可知，尽管辽朝在一国之内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也有不同的体制和各自的语言，但“因俗而治”的结果，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也促进了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地区的发展，推动了北方社会的文明进步。虽然封建化最终没有在辽朝全境内彻底完成，但从南到北封建化的趋势已经形成。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在辽朝的历史上，一定历史时期（比如辽圣宗时期）的政策导向作用，也加速了辽朝北部游牧区向封建化过渡。从整体上看，辽朝开发和经营北疆的成就是显著的。林荣贵在系统地探讨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之后得出结论说：“辽朝致力于北疆地区的经营与开发，在军政上卓有成效地突破了唐朝对北疆地区推行的近三百年一贯制的羁縻式管辖，以道、州、县三级建制为主体的政区模式系统地置于北疆地区，尽可能地扩大了军政上的直接管辖范围；辽朝重视和发挥了北疆地区畜牧业的固有优势，同时，在条件较好而又许可的草原地区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其他经济行业，发挥了牧与农相长和多种产业的辅济作用；辽朝在北疆地区还有的放矢大力吸收和发展内地传统文化，尤其是辽海地区至黄河流域等地发达文化区的经营，进一步发展了北疆地区的社会文化事业，提高了北疆境内，包括契丹族和其他各族的文化素质。从而推动着北疆地

^①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页。

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① 可以肯定，辽朝在开发北部边疆方面的贡献为此后金元时期的经营北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长期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在女真建国前，形成统一的女真民族的各种因素已经具备。^② 1115年阿骨打建立金朝，在反辽、灭辽、灭北宋的过程中，金一路南进，十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雄厚军事实力的北方政权。金继辽后，在东北草原树海中出现许多农田区或半农田区，东北经济得到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过的发展，中原形制的生产工具分布于东北各地，特别是金朝用路府州县将东北全部统一起来，对推广府州制和巩固东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③ 金朝统治的120年（1115—1234年），是辽、北宋至元朝之间北方地区又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北方社会的进步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具体说来，金朝建立之后，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改变由于战争而给北方经济带来的破坏，金太祖、金太宗统治时期最高统治者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但是由于战争仍在进行，庶事草创，各方面的矛盾复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条件还不充分，经济发展迟缓，百废待兴。到金熙宗时期，南北讲和，金朝社会开始进入稳定的发展期。在经济、政治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包括废除勃极烈制，采用汉官制；废齐国和燕京枢密院，改设行台尚书省；取消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度，将猛安谋克大批南迁，实行“计口授地”；等等。^④ 金熙宗的改革给金朝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其改革成果被金海陵王、金世宗继承，同时，这两位女真

① 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第335页。

② 参见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③ 参见张博泉等著《金史论稿》第1卷“绪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5页。

④ 参见张博泉《金史简编》第四章《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与社会改革》，第120—135页。

君主也将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海陵王在政治上对统治机构作了新的调整，废除行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取消中书、门下二省，实行尚书省一省制；在经济上对猛安谋克户继续推行“计口授地”制，加速了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步伐。金世宗统治时期，不再推行南侵政策，致力于调整社会矛盾，发展生产、详定制度，出现了所谓的“大定之治”。到金章宗时期金朝社会发展至鼎盛，从经济制度方面完成了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应该说，女真族在金代的跨越式发展与东北地区的开发是金代推进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

与辽、金两朝相比，元朝在边区经营与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大。研究边疆历史的学者认为，自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到元顺帝退出大都，北归朔漠，前后 160 多年的时间里，主要是蒙古族居住的北疆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获得显著的发展。^① 的确，漠北作为蒙古统治者的根本之地，在成吉思汗到蒙哥统治时期，它是蒙古国的政治中心，随着蒙古统治者对邻境的征服，它的经济也相应的丰富和发展起来。元朝的建立和发展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地区的开发。由于战争的结束，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经济政策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北方草原地区的畜牧业更加繁荣，草原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空前加强，农牧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可能，大批工匠进入蒙古人居住地区，加速了那里手工业的进步。从整个元朝的历史发展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统一的背景下，由于不存在此疆彼界的区别，元朝各民族之间的接触频繁，边疆地区的开发普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各地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中原汉人前往蒙古、西域、东北、云南等地，沟通与交流日益增多，有力地带动了边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如此，元朝的边疆政策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马大正总结元朝在我国疆域的形成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有三：一是将吐蕃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

^① 参见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8 页。

的直接管辖之下，为我国版图的奠定作出了突出贡献；二是一些自秦汉以来历朝各代所确立的羁縻统治区域被元朝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实施直接有效的行政管理；三是在治边的过程中元朝不断向边疆或中原地区发军屯戍，或移民实边，导致了民族杂居格局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形成创造了条件。^①也有学者对元朝在漠北的屯垦作了统计，从至元九年（1272）到至元三十年（1293），十多次调发汉族军民，发给他们农具、耕牛、籽种、衣着及钱钞等赴漠北屯垦^②。不仅漠北地区如此，元代东北地区、河西等路、畏兀儿等民族地区、云南等地的开发都是超过前代的。元朝在吐蕃设置了13个万户府，西藏从此成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也在这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在前代都是稀有的事。^③历史证明，元朝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边区的开发与建设，成就突出，影响更加深远。

由上述可知，充满勃勃生机的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给10至14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书写了开发边疆与建设边疆的新篇章，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二 各民族的交往与重新组合

辽金元三朝的建立者都是崛起于边区的民族，在开拓疆土和实现区域统一以及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在有效实行对各族统治的实践中，由于战争，或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婚姻的等方面的原因，自然的人口迁移和人为的人口迁移频繁发生。不同民族的人因此有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其结果使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

① 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页。

③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